

山西移民史

安介生、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山西移民史

安介生、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西移民史 / 安介生著. --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5457-0859-2

I. ①山… II. ①安… III. ①移民—历史—研究—山西省 IV. ①K29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7486 号

山西移民史

著 者: 安介生

责任编辑: 董润泽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总编室)

0351-4922203(印制部)

网 址: <http://www.sjcsb.sn>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4.125

字 数: 43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14 年 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2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859-2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家山何止大槐树(代序)

葛剑雄

在中国移民史上辐射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移民发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树了。“问我祖先来(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这两句流传了数百年的民谣,在华北的老一代中几乎是尽人皆知的。随着华北人口的外迁,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又扩散到全国各地。有学者考证,“洪洞古大槐树移民”分布在11个省、市的227个县。

有关大槐树的传说、故事、民谣等口碑资料,足以编成一部多卷本的大书,有关族谱中的记载也不胜枚举。对大槐树移民史实的研究,早在清末民初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近一二十年来的成果更多。由于这是山西移民史中至今影响最大的事件,自然也是安介生这部《山西移民史》中重要的一章。据他综合前人成果和自己考证的结果,从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开始至永乐年间(1403—1424),由官方征发或组织的山西移民就远远超过百万,他们的足迹遍及今北京、天津、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各地,而自发性的和永乐以后的移民也大量存在。经过数百年的生息繁衍和再迁移,要说当年山西移民的后裔遍及华北以至全中国实在并非过分。尽管这些移民的故乡实际包括山西各地,但

洪洞大槐树是移民迁出地的象征，已成为山西移民后裔心目中的故乡。

不过，大槐树移民影响再广、意义再深，也只是山西移民史的一部分，而整个山西移民史所必须研究和论述的空间和时间范围自然要大得多，所以才有必要写这部《山西移民史》。而作者之所以要选择这个题目，我想他不仅是为了回报山西对他的养育之恩，而且是因为山西在中国移民史上有特殊意义的重要地位。

通过作者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山西历来是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从秦汉以来，每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如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永嘉之乱”至南北朝、“安史之乱”至唐末五代、“靖康之乱”至元末，都有大批山西人外迁。而自明朝以来，无论是“大槐树移民”，还是近代向内蒙古、东北和其他边疆地区的移民，山西人都占有重要地位。

山西同时也接收了大量外来移民，从夏、商、周时代频繁迁入的部族、封国和宗族，从汉代开始的少数民族内迁，南方居民被强制北迁，北魏时大规模移民于代地，直到近代，大批外来移民在山西定居，与本地人融为一体，成为山西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山西处于传统的华夏(汉)与非华夏相交的区域，也由于山西的地形地势在华北和全中国所拥有的战略地位，山西移民史还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一是大量内迁的少数民族和外来民族以山西为归宿，不仅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绝大多数最终融合于汉族。举凡中国历史上主要的少数民族，如狄、戎、胡、匈奴、越、羌、鲜卑、羯、氏、丁零、高车、柔然、高丽、奚、西域诸族、突厥、回鹘、沙陀、党项、契丹、渤海、女真、蒙古、回、满等族，都曾迁入山西，有的就是在山西融入汉族的。今天的山西人如果追根溯源，完全可能远及蒙古高

原、中亚草原、咸海之滨、恒河流域。

一是每当分裂或战乱时期,山西往往成为北部中国的战略要地或政治重心,因而既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也成为大批难民的庇护所,从而出现一个经济文化相当繁荣的阶段。如北朝后期,晋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元之际,山西是北方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元末明初,山西是北方唯一能够大量输出人口的省份。这些当然是长期吸纳、融合外来移民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研究山西移民史的价值已经超出了它的地域范围,这部《山西移民史》的价值也不会局限于山西一省。

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口在时间和空间中活动的结果。文化是以人为载体的,主要靠人口的流动来传播和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移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活动。我在《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导论》中指出:没有移民,就没有中华民族,就没有中国疆域,就没有中国文化,就没有中国历史。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对整个中国如此,对一个省、一个地区更是如此。试问,如果不了解本地人口的来源和去向,又如何能全面了解和正确理解本地的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各方面的状况?除非一个地方完全处于封闭之中,但这样的地方毕竟有限吧!

据我所知,尽管地区性、阶段性的人口迁移史已有问世,但以一个省为地域范围的移民通史尚未出版,所以当安介生先后完成了以山西移民为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以后,我就鼓励他在此基础上撰写《山西移民史》。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在今年上半年完稿。而从他开始研究山西移民史算起,差不多已经有七个寒暑了。对于负有一定指导责任的我来说,自然不应该对本书的质量如何发表先入为主的意见,我要说明的只是:作者治学的态

度是严肃认真的。

我强调山西移民史的价值,强调移民史研究的重要性,并无抬高这本书的目的,也不是出于专业的偏爱。十多年来,我在与同人合作研究中国移民史的过程中,深感与其重要性与广泛性相比,我们的学力和精力都太有限了,尽管我们出版了六卷本的《中国移民史》,但即使就通史而言,遗漏和空白还相当多,错误更难以避免,何况更加具体深入的区域研究!所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同行、特别是青年学者来从事移民史研究,希望有更多的省、地区性移民史问世。

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移民数量之多、距离之长、范围之广、影响之大,都是绝无仅有的,而目前我们对移民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能相称,成果还太少。全社会对移民历史关注不够,这是主要原因。

家山何止大槐树?麻城孝感乡、宁化石壁寨、江西瓦屑坝、苏州阊门外、南雄珠玑巷、山东枣临庄、南京杨柳巷、南昌筷子巷……无不是千百万移民后裔梦魂萦绕的故园家山。黄河长江,中原大地,西域东海、北疆南岛,中国历史上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又有哪里没有渗入中华民族这棵参天大树发达的根系?

相信中国移民史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山西移民史》也会如此。

1998年年9月8日于英国剑桥

导 言

一、先秦至清末山西移民史研究之价值及现状

本书专门论述先秦至清末山西地区移民运动的过程及其规律。

人口迁移作为导致人口变化三大要素之一（出生率与死亡率是另外两个），历来是人口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中国历史悠久，幅员广阔，历史时期人口迁徙活动相当频繁而剧烈，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十分深远。正鉴于此，现代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了对历史时期人口迁移即中国移民史问题的探讨。以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为例，从《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的公开发表，到《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等论文的问世，卓识宏文，嘉惠后学良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谭先生又发表了《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发凡与举例》等文章，着重对移民史等问题的研究作了纲领性的概括与总结，高屋建瓴，为中国移民史这一学术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①就山西移民史研究而言，民国时期也取得了不俗的研究进展，其中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便是著名学者马长寿先生所撰《洪洞迁民的社会学研究》，这篇长文运用相当成熟的历史学与社会学方法，对于极富影响的洪洞大槐树移民问题进行了颇具开拓性的深入研究。^②

^①谭其骧先生有关移民史及山西地方史的论著，参见《长水集》（上、下）及《长水集续编》。

^②该文载于《社会学刊》1931年第4期。

近二十年来,在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积极努力下,中国移民史与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初具规模,许多功力扎实的学术专著的出现,已将历史时期中国人口迁移的研究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移民史方面代表性的成果之一,当属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三位先生共同推出的《简明中国移民史》以及葛剑雄先生主编,由他们三人分撰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特别是多卷本《中国移民史》,煌煌六大帙,洋洋数百万言,堪称宏篇钜制。这一巨著是这些先生多年辛勤耕耘的硕果,更是多年来中国移民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一系统著作不仅详尽地总结分析了先秦至20世纪前期发生在中国境内各次重要移民运动过程,而且对于移民史研究中所涉及到的概念、理论问题进行了鞭析入理的阐发。可以说,从宏观纵向上对中国历史移民问题进行探讨、评判的工作已达相当高的水准,这为进一步具体而微观的讨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③

人口迁徙与移民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以某一朝代或重要时期为断限的历史人口地理学研究成果十分引人注目,其价值早已为学术界所肯定。如葛剑雄先生《西汉人口地理》、冻国栋先生《唐代人口问题研究》、吴松弟先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张国雄先生《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等专著均已面世,这些著作均是国内外学术界在这一领域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因而是深入的人口迁移研究所必需的参考文献。至于有关历史上重要的人口迁徙运动的研究同样成绩不凡,如周振鹤

^③作为葛剑雄先生的学生,我对山西移民史的研究就是在这一系列著作所构造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故而在研究中不再对涉及到的概念、理论问题作重复解析。例如移民史最基本的概念为“移民”,而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就此概念形成统一认识。本书选取《中国移民史》有关“移民”的定义作为讨论的基础,即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这种明确的概念使我在研究中受益匪浅。

先生《唐代安史之乱与北方人民的南迁》、徐泓先生《明洪武年间的人口移徙》及《明永乐年间的户口移徙》^④等等。这些力作使我们对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迁移问题有了崭新而深刻的认识。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相比之下，以某一特定区域为范围的移民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当然，上述可观的研究成果必定包含了对具体区域移民活动的分析，但这终究无法取代区域性系统全面的深入研究^⑤。

区域间演变与发展的不平衡，正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出发点。按照国际人口学界的惯例，人口迁移的种类首先大致分为国内迁移(Internal Migration)与国际迁移(International Migration)。针对中国历史与地理状况，省际人口迁移问题理所当然成为移民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谭其骧先生十分重视移民史分地区、分阶段的研究，并在文章中强调：“搞清楚当前各地区人民的来历，才是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⑥《湖南人由来考》一文，即为先生身体力行，有关区域性人口迁移研究的典范之作。移民史研究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探明当前各地区居民来源的构成状况，然而各地区居民来源的构成具有极强的时段性，就同一地区而言，在不同的时代，其居民的来源构成可以相差悬殊。因此，以某一省区范围为

^④前者见《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2、3期合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后者见《第一届历史与中国社会变迁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央研究院”，1982年版），及《（台湾）国家科学委员会研究汇刊·人文及社会科学》一卷二期，1991年7月。

^⑤自拙著于1999年出版以来，区域性移民史研究又取得了不少进展，迄今出版的区域性移民史著作有：薛平控著：《陕西历史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苍铭著：《云南边地移民史》，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林国平、邱季端著：《福建移民史》，方志出版社2005年版；谭红主编：《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陈世松著：《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刘德增著：《山东移民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未公开出版的学位论文有：薛政超：《湖南移民史研究（618—1279）》，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⑥见《长水集》自序，第4页。

界限,分阶段地详细分析不同时期人口迁移的特征,找出其移民运动变化的历史轨迹及规律,已成为深入研究移民史的首要课题。

众所周知,谭先生是山西地方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自从《山西在国史上的地位》一文发表之后,不仅山西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重新为学术界认识,而且在此文的启发下,继起之作涌现不少,有力地推动了山西地方史的研究。明朝初年,以著名的洪洞大槐树为集散地标志的向外大移民运动是山西移民史的重要分界点之一,这次大移民对现代中国许多地区的人口构成有着重大影响,故而在中国移民史上也占据着显赫的位置,众多研究者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一阶段也就成为山西移民史上研究成果最多、最集中的时期。^⑦清代以至民国时期,大批山西移民跨过长城,开发塞外,又创造了“走西口”的历史传奇,为长城内外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民族融合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⑧

然而,在这些著名移民运动的前前后后,山西地区人口构成的变迁情况又是怎么呢?山西地区历史人口迁徙的轨迹又是怎样呢?解决这些问题,无疑对深入了解山西移民史乃至中国移民史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本书想要详细论述的内容。当然,山西移民史作为地方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不少地方史的研究成果同样包含了对山西历史人口及移民问题的讨论,如《山西通史》、《山西历史人口统计》(上、下卷)、《中国人口》(山西分

⑦参见高胜恩、楚刃著:《洪洞大槐树移民》,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张青主编:《洪洞大槐树移民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⑧近些年来,关于“走西口”移民运动的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进展十分喜人。主要著作有:闫天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王卫东著:《融会与建构:1648—1937年绥远地区移民与社会变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徐黎丽著:《走西口——汉族移民西北边疆及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等。

册)、《山西历史政区地理》、《山西历史经济地理述要》等著作都已问世,为进一步的探索奠定了基础。^⑨

二、本书论述的地域范围与时段划分

本书讨论的地域范围以今天山西省所辖地区为限,但如在研究中仅笼统地以“山西”为讨论对象,显然过于粗略,会直接影响研究的深入与结论的准确。因此,有必要对山西内部的自然地理特征作一简要的分析与总结。关于山西地理形势,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的摹状最为扼要传神: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⑩

今天山西省界的确定可谓符合“山川形便”原则的典型,这种封闭式的、泾渭分明的地域界线为我们进行历史时期的区域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今天山西省界的形成,本身是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山西各地区在行政区划上并没有完成整合,在当时人的观念中,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就名称而言,历史上的所谓“河东”、“并州”等名号的范围,与今天的山西省域并不完全吻合;另一方面,在很多王朝中,今天山西省辖的各个地区,往往与省外的一些地域处于同一个行政区之内,有些时候,部分地区甚至为不同政权、民族所割据。因此,在研究中随意使用“山西”之名,往往是错误与缺乏实际意义的。^⑪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研究中理应使用较小范围的地域名称,以适应

^⑨上述著作的作者及出版社情况,均见本书后附《主要征引文献目录》。

^⑩顾祖禹:《山西方輿纪要序》,见《读史方輿纪要》。

^⑪关于“山西”这一地域概念内涵的历史演变,参见拙文:《“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晋阳学刊》1997年第2期。

各个时期行政区划的不同。笔者认为:将今天的“地区”范围作为讨论的地域单位最为妥当,因为它一方面适应了山西历史时期行政区划演变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更加精确地与自然地貌特征相一致。因为不仅山西省外部界线的形成符合“山川形便”的原则,而且“地区”一级界线的划定,也主要决定于山川形势的因素。

然而,就“地区”一级政区而言,各个时代的名称与范围也常常出现交叉与变更,至1988年,山西全省共辖六个地区(雁北、忻州、晋中、吕梁、临汾、运城),六个省辖地级市(太原、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⑫长治市与晋城市原来合为晋东南地区。如果再将省会太原与几个地级市归入实际所处地区之中,就可以说,这七个地区的划分最为合理、妥当,因为它最准确地反映了山西省自然地貌特征,并与历史时期行政区划演变的规律相适应。为了表述的简明,在古今政区对照中,本书更多地使用这七个地区的名称。现将这七个地区的自然地貌特征与界线作一简单勾勒。

按地貌特征,山西全省大致可分为七个区域,即大同盆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临汾盆地、运城盆地、沁潞高原和晋西高原,上述山西所辖七个地区,正是建立在这七个自然地理区域之上,各个区域间有相当明确的自然界线。雁北地区北临蒙古草原,处于内、外长城之间,南以恒山与忻州地区为界。忻州地区北以内长城与雁北地区为邻,西有吕梁山,东有太行山、五台山,南隔石岭关与晋中地区相望。晋中地区位于全省的中部,北起太原以北的石岭关,南至灵石县境的韩信岭。临汾地区位于太岳山(即霍山)之南,往南至曲沃一带折向西直至黄河沿岸。运城地区北起峨嵋台地,与临汾地区相隔,东南达中条山麓,西邻黄河与渭河盆地相望。吕

^⑫参见《山西历史政区地理》,第276页。

梁地区西隔黄河为界,与陕北高原遥遥相对,东面雄伟的吕梁山形成环形屏障,将该地区与忻州、晋中、临汾等地区分割开来。晋东南地区处于太岳山与太行山之间,中间包括长治、晋城等山间盆地。^⑬

晋中、雁北、忻州、临汾、运城、晋东南、吕梁七个地区的划分,其意义并不仅限于我们移民史的讨论,历史时期山西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分区,也主要建立在这七个地区的基础之上。既然一定数量的人口是构成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要素,而人口迁移决定了各个区域人口的分布状况,不可避免对各地经济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人口又是文化最活跃、最丰富的载体,人口迁移导致各地区人口构成的变化,势必影响各个区域的文化特征。本书在研究中较频繁地运用这七个区的概念,原因即在于此(见附图 1)。

葛剑雄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将中国移民史分为四个阶段,即

第一阶段:公元前 220 年以前,即先秦时期。

第二阶段: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1368 年,即秦朝至元末。

第三阶段:公元 1368 至 1850 年,即明初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

第四阶段:公元 1851 至 1950 年。^⑭

本书讨论的时间界限定在先秦至清末,基本上覆盖了上述分期中除民国外的各个阶段。虽然山西地区人口迁移在整体上从属

^⑬山西自然地理界限的分划,参见《山西省地图集》,山西省测绘处与山西军区测绘处 1973 年编制。

^⑭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导论》第二章“中国移民史的分期、历代移民的类型与特点”,第 42~47 页。

于中国移民史,是全国移民史的一部分。然而,山西移民史的演变规律,与中国移民史的总体变迁并不完全吻合,这也正是本书想要特别强调之处。而要揭示山西移民史发展中所独具的特征,首先必须根据历史时期山西地区人口变迁的实际状况做出更细致的分期。

不言而喻,能否准确分期的关键,在于能否准确把握影响山西人口变迁的主要线索。山西北部与西部正好处在中国经济区域中农牧业分界线之上,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盛衰消长对山西地区的发展及人口变迁影响甚巨,这是对该地区移民史进行分期的最好线索。如秦至元末,山西地区曾几次不同少数民族由北向南席卷的经历,这也就相应构成了山西移民史的几个阶段。明朝强大的北方边防体系有力地遏制了蒙古人的南下,从明末开始,包括整个清代,南北关系趋于平和,为山西人口的变迁提供了新环境,形成了一个较独立的新阶段。故而,从先秦至清末,山西移民史可分为七个主要阶段,试将这七个阶段的特点简要胪列如下:

第一阶段:先秦时期 这一时期较为特殊,可谓古老的华夏族在山西渐居统治地位的时期。在缺少文献记载的上古时期,我们只能依据现有考古发掘的成果,管窥远古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的分布情况。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华夏族与所谓“夷狄”在山西境内处于平分秋色的地位。但从文献记载看,晋国的发展史却是华夏族驱逐与排斥其他少数部族的过程,但这种驱逐与排斥包含了民族的融合与进步。另外,这一阶段秦晋两地的亲密关系也导致了两地人口迁徙异乎寻常的频繁。这种迁移对两国的发展都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第二阶段:秦、两汉、魏晋直至十六国前期 这一时期可谓“匈

奴进入期”。自秦朝统一中原之后，匈奴便成为威胁汉族中央王朝安危的最主要的少数民族。汉朝开国之后，匈奴势力渐趋鼎盛，无论屈辱的“和亲”政策，还是多次重兵横扫，都无法维持长久的边区和平。真正削弱匈奴南下抢掠势头力量乃是其内部的分崩离析，南单于入居塞下开始了匈奴部众向山西境内的合法入居。北单于成为东汉朝廷与南单于合力攻击的目标，北单于惨败远遁的同时，南单于所领部众南下迁居的步伐也在加快。这期间，西面羌族对汉族地区也曾频繁攻掠，但影响山西人口变迁的主要还是匈奴族。在西晋短暂的统一中，不少朝臣已预见到大批入居中原（包括山西）的匈奴人可能带来的问题。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正式拉开了大动乱的序幕。在人口锐减的同时，肇始“永嘉南渡”——汉族第一次大规模南下移民运动，不少山西人跻身其中，参与了南方新政权的建设，而留在山西地区的匈奴人也创立了自己的政权——前汉。

第三阶段：十六国后期以至整个北朝 此期可谓“鲜卑进入期”。匈奴人西迁或南下之后，鲜卑人很快填补了大漠中的空白，继东部鲜卑之后，拓跋鲜卑将本族的中心根据地推向了山西。强有力的北魏军队统一了北部中国，而其势力鼎盛时期的首都就是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在定都平城期间，北魏统治者向山西地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平城由此成为北部中国人口最多、文化繁荣的鼎盛之区。然而，人口的大量聚集同时为这一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质上是一场山西人口的大迁出。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之后，山西又成为这两个政权交争之地。此外，匈奴苗裔——山胡在山西境内的居留也成为影响山西人口迁徙的重要因素。

第四阶段：隋唐至五代中后唐的灭亡 这在山西移民史上是

较为复杂的时期,以单一民族的活动为线索是较为困难的,但仍可以突厥的发展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隋唐前期,北部边区的主要威胁来自突厥,但不久之后,降服于唐朝的突厥人开始进入中原,这其中包括山西地区。后来党项人与契丹人的势力也波及到山西,多次人口的掳掠客观上造成了大量人口的北迁。“安史之乱”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由此引起的社会动荡与人口迁徙相当剧烈,但已有学者注意到在“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中,山西人所占的比例是相当有限的。这可算山西历史人口迁移自身特点的一个体现。在“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中,山西地区的地位是相当特殊的,以山西为根据地的沙陀人李克用最后终于在中原崛起,成为一世霸主。

第五阶段:从后晋建立到北宋结束 此期可谓“辽宋分割期”。这一阶段是从石敬瑭屈辱割让“燕云十六州”开始。石敬瑭这一举动对于中国北方汉族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的攻守形势影响巨大。“燕云十六州”归属契丹人管辖后,契丹骑兵对并州地区的攻掠大大缓解,而河北地区则成为他们纵横驰骋的主要区域。在北宋时期,山西地区虽然肩负着抵御“西北二边”的重任,但实际上北宋朝廷却旨在这一地区建立边防基地,为此多次大量向外迁出当地人口。“澶渊之盟”签订以后,辽宋双方基本保持休兵状态,然而就雁门关一带双方边界的划分展开了长期的交涉。

第六阶段:金元时期 在这一时期,女真人和蒙古人相继进据山西。辽国境内汉人的南下,对女真人入居山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女真人入居山西的形式,与以往任何北方民族都有所不同,不是散处于汉族人中间,而是结成独立的军事性社区,目的在于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与对汉人的威慑。“靖康之乱”又使大量中原百姓南奔,而金朝统治者又多次迫使南下的汉人北上,这恐